

北京影视出版创作基金扶持作品

突破思想瓶颈

改革 40 年的政治经济学

TUPO SIXIANG PINGJING
GAIGE 40 NIAN DE ZHENGZHI JINGJIXUE

杨春学 主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突破思想瓶颈

改革 40 年的政治经济学

TUPO SIXIANG PINGJING
GAIGE 40 NIAN DE ZHENGZHI JINGJIXUE

杨春学 主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突破思想瓶颈：改革 40 年的政治经济学/杨春学主编. --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 11

ISBN 978 - 7 - 5638 - 2889 - 0

I. ①突… II. ①杨… III. ①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中国—现代
IV. ①F09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4665 号

突破思想瓶颈——改革 40 年的政治经济学

杨春学 主编

责任编辑 晓孟

封面设计 风得信·阿东
Fondesy Design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 (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 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 (传真)

网 址 [http: //www. sjmcb. com](http://www.sjmcb.com)

E - mail [publish@cueb. edu. cn](mailto: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砚祥志远激光照排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31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38 - 2889 - 0/F · 1592

定 价 75.00 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对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直接针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即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曾高度评价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①为什么他会这样评价呢？因为这个《决定》突破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不能搞商品经济的思想禁锢，回答了困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使经济体制改革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恩格斯说：“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②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生动地诠释了这个著名的论断。

改革是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一方面是改革的实践谱写出来的；另一方面是理论探索的结果。有三股力量相互交织和强化，推动着改革不断深入和发展。这三股力量就是改革实践取得的实效、理论界的努力和高层决策者的推动。

如果把改革及其思想历程视为邓小平所说的“写作”政治经济学的过程，那么，时值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们来思考一下这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3．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43．

样一些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种“写作”是如何进行的？其中经历了什么样的困难？现在写到了什么程度？只有明了这一思想历程，我们才可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在其中，经济学家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

2005年接受《中华工商时报》记者采访时，丁学良教授曾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丁学良教授的标准是：能否在国际经济学界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如果以丁学良的这种标准来说，也许这是事实。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标准（即“经世济民”）来看，情形又会如何呢？

我们认为，如果以“经世济民”的标准来看，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的贡献是很大的。这种贡献不在于在理论上以国际学术刊物标准来衡量有什么原创造性的贡献，而是主要体现在下述两个方面。第一，为重大体制改革决策提供巧妙地辩护、思路 and 理论根据，让决策者能够绕开或摆脱意识形态方面的桎梏。这类思路 and 理论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改革中的作用最为突出。第二，为实践中出现的、新生的各种改革形态摇旗呐喊，为各级政府提供改革的政策咨询。

就以“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来说，获奖者包括杜润生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厉以宁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的“整体改革理论”，华生研究组、田源、张维迎的“价格双轨制理论”，马建堂、周叔莲、江小涓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理论”，黄达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林毅夫研究组、张军、樊纲的“过渡经济学理论”，李实、赵人伟、陈宗胜等人的“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论”。这些经济理论反映出中国经济学家对改革实践的独特思想贡献。当然，这种独特的贡献不限于上述几项，还有更丰富的内容。这些理论贡献全面改写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即邓小平所说的

“政治经济学初稿”），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本书就是力图总结这一“改写”的思想历程和基本内容。时值改革开放40年之际，回顾这一思想历程，其意义不证自明。书名之所以取为“突破思想瓶颈”，旨在强调改革开放之前传统的思想意识对改革所形成的阻力、改革对这类思想束缚的不断突破。基于这种考虑，本书选取下述七个方面的改革理论而述之。

“初级阶段理论”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国情而对社会主义建设所做出的一种最基本的判断。那就是中国已经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但是，如果以经典著述关于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母体”之中的社会主义形态为参照系来看，这种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形态。它的核心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走向“发达的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此，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制度安排，诸如多种所有制经济、多种分配形式等的存在，都是与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相容的。虽然这种理论形成于改革开放过程，并以党的十三大报告作为正式形成的标志且在其后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但其先声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争论，其雏形早于存在于共产党人在建国过程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思考之中。初级阶段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的最基本理论参照系。正是“初级阶段”这一正确的判断，给我们的改革提供了历史方位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了广阔的思想空间。正是得益于对社会主义的这种定位，让我们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使我们得以开启市场化和所有制改革，使我们可以用辩证的方法来看待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

“所有制改革理论”是争论最激烈的领域。凡是涉及所有制问题的改革，诸如农村土地承包到户、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国有企业的各种改革（包括股份制、“抓大放小”），无一不引来激烈的争论。因为，这类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争论的核心是“姓公”还是“姓私”的问题。争论的意识形态之结在于，传统理论认为，所有制决定着一

个社会的性质；只有公有制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基石。所有这类争论都以官方的改革政策选择而获得暂时的平息，而这种选择的理论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且最终明断“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尚有一些理论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诸如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性质、公有制的形态类型、公有制与社会公平的关系等。只有解决好这类问题，我们才可能形成一种与基本经济制度相一致的综合性所有制理论。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所针对的是改革“计划经济”。这种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商品经济理论、市场取向改革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转轨经济学。这些理论认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演进的。在这一演进过程中，所引起的争论也曾经是非常激烈的，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达到高潮，核心是“姓资”“姓社”问题。因为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计划经济”被视为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特征，是控制经济有序发展的制度安排；而市场经济则被斥为资本主义经济。借助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精神，党的十四大报告一锤定音，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平息了这场争论。紧接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和思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了一个新的共识，那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如何使这一共识落实在实践中，改革正在努力。

“价格改革理论”虽然不像前述三种理论那么宏大，但却是改革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体制改革理论存在着内在的关系。因为价格改革是经济市场化的核心机制问题。改革之初，这种改革是以最基本的经济理论（即对价值规律的重新认识和强调）开始的。在改革之前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学家就对这种理论进行过丰富的思考。虽然这种改

革不涉及意识形态，但事关改革可能引起的利益分配调整和社会经济秩序问题。因此，如何改革，也是有很大争论的。最著名的争论是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关于价格体制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位置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价格改革还是所有制改革？就如何进行价格改革而言，最富于创新意味的是80年代中期提出的“价格双轨制”思路。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明确，加之“价格双轨制”本身存在内在的缺陷，价格改革的主体思路也就自然转向了建立主要由市场力量形成的价格机制、加快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并轨上。至今天，这一改革尚未完成。

“收入分配改革理论”始于对“四人帮”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强调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展开以及随之而来的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和收入差距的扩大，分配理论面对的是如何对改革过程中的一些现象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这种解释的主流观点有一个演变过程，从“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发展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承认资本、技术等要素按其贡献分配的合理性。针对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现象，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始于“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国家更加重视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新时代”将更加重视“共同富裕”的问题。当然，这些解释在具体的理论依据方面还存在不同的各种争论。

“对外开放理论”是在有关领域改革实践的争论和思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开展对外贸易，几乎不存在争论。但是，对于引进外资、设立“经济特区”等带有实质性内容的“开放”政策，曾出现带有政治意识形态意味的激烈争论。支持者强调这种开放形态可以有效地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学习管理经验，并用“以市场换技术”和“试验性改革”作为主要的依据。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类观点发展成为以“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为主体的理论，并在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加入WTO等问题的争论中获

得不断地丰富和完善。最新的进展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它的思想基础是习近平关于基于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这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达到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

“宏观调控理论”几乎都是针对宏观经济现象的变化及应对它们的政策本身进行讨论的结果，而且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发展。从改革之前的“综合平衡理论”走向“宏观调控理论”，再到对宏观调控体制和政策本身的思考，以及最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问题，构成了最富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理论。所谓“宏观调控”并不限于财政和货币政策，还包括产业、区域政策；还包括发改委等调控机构。宏观调控理论不仅涉及对各类政策的具体工具的选择问题，还包括对这些政策之间关系的理论探讨，以及对历次重大调控政策的实践结果的反思。

在实践中，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是非常成功的，虽然其中还存在大量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40 年的经济成就就是事实证据。它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奇迹”，就社会经济基础和结构的变化而言，也是奇迹。至于在理论上，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如果按照严格意义的“理论”概念来说，它们基本上只能算作是一种思想，还有待提高理论化的深度。学界有关改革的重大争论，通常是通过中央的政策选择来暂时获得平息的。这样一来，其间还有一些理论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和深化。“理论”和“思想”在概念上是有差别的。一种“思想”要成为一种“理论”，必须遵循严格的逻辑。其中，不证自明的称之为“公理”，推导的过程叫“推理”，推导出来的东西叫“定理”，最后的结论叫“真理”。某个结论是否是“真理”，并不是哪个人说了算，而是要看它的获得是否符合科学的方法论约定的一系列规则，要看它引出的政策结论是否得到实践的检验和证明。对政治家来说，改革的关键，不在于改革方案背后的分析是否精巧、是否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而在于改革方案是否能解决实际问

题。对这种方案提供精巧的理论解释，是经济学家的基本任务。“理论真理”与“实践真理”之间是有距离的。在这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改革的本质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这必然会带来利益的冲突和争论。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在用什么样的方案进行改革等具体的问题领域，出现了意见分歧，这是很正常的。有人把改革的争论者分为支持者和反对者，这带有误导的性质。事实上，除了极个别论点之外，争论都是对如何改革的不同意见的表述，都是推动改革的力量。至于选择哪一种政策建议或方案，考验的是决策者的智慧。

“理论真理”与“实践真理”之间是有距离的。在这方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近年，经济学家在进行着大量的努力，讨论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大问题。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发表了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例如，逢锦聚：《〈资本论〉的体系结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3期）；林岗：《在新时期如何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1期）；刘伟：《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2016年第5期）；洪银兴：《以创新的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经济研究》2016年第4期）；杨瑞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7期）等。理论仍在发展让我们共同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而努力！

本书作者的分工是：前言、第一章、第三章，杨春学；第二章、第五章，沈宏亮；第四章、第六章，王少国；第七章，郝宇彪；第八章，陆明涛。杨春学负责主持大纲设计和统稿工作。

最后，要特别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杨玲社长和薛捷编辑。没有他们的邀请，不可能有此书的问世。《突破思想瓶颈》这一书名，就来自薛捷同志。

本书为“北京影视出版创作基金扶持作品”，同时是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基地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中国概况”的建设成果之一。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导论/ 1

- 第一节 改革共识是如何凝聚的? / 1
- 第二节 改革开放的重点为什么是经济领域/ 4
- 第三节 经济改革的基本经验/ 8
- 第四节 新时代: 凝聚新共识/ 12

第二章 初级阶段理论/ 16

- 第一节 初级阶段理论的先声/ 16
- 第二节 初级阶段理论的诞生/ 21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体系的形成/ 24
- 第四节 初级阶段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发展/ 28
- 第五节 初级阶段理论的最新发展/ 36

第三章 所有制改革理论 / 47

- 第一节 引论/ 47
- 第二节 所有制改革 (一): 农村承包制及其争论/ 50
- 第三节 所有制改革 (二): 非公有制经济及其争论/ 57
- 第四节 所有制改革 (三):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及争论/ 64
- 第五节 所有制改革理论的共识/ 70
- 第六节 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74

第四章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 78

- 第一节 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 78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 86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 100

第四节 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理论趋向/ 112

第五章 价格改革理论/ 118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的探索/ 118

第二节 价格改革的启动：以调为主/ 126

第三节 价格改革的深入：价格双轨制与价格闯关/ 130

第四节 市场价格体制的确立与价格边际性改革/ 143

第五节 价格改革的成效与反思/ 148

第六章 收入分配改革理论/ 158

第一节 从单一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158

第二节 从效率优先到更加注重公平/ 177

第三节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变动及其治理/ 190

第七章 对外开放理论/ 201

第一节 闭关自守与自力更生/ 201

第二节 1978—1992：自力更生为主，对外经济合作为辅/ 203

第三节 1993—2007：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215

第四节 十八大以来：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
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239

第八章 宏观调控理论/ 254

第一节 宏观调控的提出与内涵/ 254

第二节 中国宏观调控的制度体系及其转型/ 266

第三节 宏观调控政策实践及思辨/ 273

第四节 对现有宏观调控的反思和改革展望/ 280

第五节 新时代宏观调控体系的展望/ 290

第一章 导论

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是借助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以小岗村农民为代表的民间自发力量拉开序幕的。

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先声，邓小平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的讲话（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指出：“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容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① 1978年12月22日发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② 由此，正式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号角。

第一节 改革共识是如何凝聚的？

1976—1978年是改革开放的酝酿阶段，形成了“必须改革”的共识。这种共识是通过反思“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方式获得的。或者说，改革的共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这种副产品是以悲剧的形式产生的。“拨乱反正”可以视为改革开放的伴奏曲。从“拨乱反正”走向改革开放，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因为，正是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孕育出了改革的一些重要因素。例如，通过“拨乱反正”重新走上政治舞台的一批老干部，曾经身受旧体制之害，激发了他们改革的意识和决心。正是因为“拨乱反正”受阻而催生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

① 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2。

② 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11。

大讨论，解放了各类精英的思想，使他们在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中酝酿着改革的思路。可以说，改革前夕，希望改革现有体制的力量，遍布各个阶层。这些力量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和揭批“四人帮”的活动而走上台面。

一、改革共识的社会基础

改革前夕，“文化大革命”在政治、社会、经济、思想等领域带来的悲剧性结果，使得希望改革现行体制的动力遍及社会各个阶层。邓小平就多次谈到“文化大革命”与改革的关系。他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它“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①。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在政治上，“文革”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据统计，“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此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地主富农分子等受到歧视。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在默默地反思体制的问题，例如顾准等人。

在知识界，“文化大革命”和之前的“反右运动”对教科文卫的摧残也非常严重，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就以“反右运动”来说，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人就多达55万。虽然其中的30多万人在1959—1964年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在现实中，他们的工作安排，子女的教育、就业等方面仍然受到歧视。在“文化大革命”中，旧事重提，他们又深受冲击，思想上陷入痛苦的境地，最渴望“科学的春天”。

在经济上，“文革”使经济建设受到极大的破坏。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城市居民面对各种购物票证，深感物质生活的匮乏。农民的生活更苦，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处于赤贫状态。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131，1244-1245。

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因此，一般老百姓最渴望的是改善物质生活条件。

所有这些改革的力量，都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走上前台，人们以不同的形式在思考着同样一个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二、改革共识的形成

“拨乱反正”是凝集改革共识的奏鸣曲。

在政治上，“拨乱反正”的标志是纠正冤假错案，数以千万计的人获得了政治上和身份上的解放，一方面使一批老干部重新走上政治舞台，促使身受“文革”之害的他们下决心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也使一大批知识分子获得平反，焕发了青春，他们构成了改革在决策和思想上的中坚力量。

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的标志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和由此而引发的大讨论。文章非常精彩地指出：“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是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

正是这些观点带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真正重新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了个人迷信、“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把人们从毛泽东晚年错误、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中解放出来，从而为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等一系列新政策、新主张、新思想、新办法提供了思想空间和条件。

真理标准的讨论解放了知识精英和广大干部的思想，使他们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想的过程中酝酿着改革的思路。例如，1977年和1978年经济领域“拨乱反正”涉及的重大问题有四个：一是纠正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

换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否定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三是否定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提出了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四是反思以往的经济管理方式，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这些问题的讨论受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的重视和肯定，特别是邓小平直接推动了这一讨论的开展^①。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标志着改革共识的正式形成，那就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如果现在再不进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②《公报》还特别指出：“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③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实质上是这次全会的主旨报告。多年之后，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评论说：“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第二节 改革开放的重点为什么是经济领域

从前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包含的改革并不限于经济领域。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④那么，为什么改革的重点会选择在经济领域？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① 参阅韩钢. 最初的突破——1977、1978年经济理论大讨论述评 [J]. 中共党史研究, 1998 (6); 李正华. 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 [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

② 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5: 7.

③ 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5: 14.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下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1134.